

The Seduction of Culture in German History

[德国] 沃尔夫·勒佩尼斯 著

刘春芳 高新华 译

Wolf Lepenies

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The Seduction
of Culture in
German History**

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

【德国】沃尔夫·勒佩尼斯 著 刘春芳 高新华 译

Wolf Lepenies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德)勒佩尼斯(Lepenies, W.)著;
刘春芳,高新华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5

书名原文: The Seduction of Culture in German History
ISBN 978-7-5447-1096-1

I. 德… II. ①勒… ②刘… ③高… III. 文化史-研究-德国
IV. K516.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4409号

The Seduction of Culture in German History by Wolf Lepenies

Copyright © 2006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10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re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8-190号

书 名 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

作 者 [德]勒佩尼斯

译 者 刘春芳 高新华

责任编辑 王 蕾

原文出版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毫米 1/16

印 张 18.5

插 页 4

字 数 190千

版 次 2010年5月第1版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1096-1

定 价 2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025—83658316)

导 言

德累斯顿上空的炸弹与《玫瑰骑士》

1945年2月13日,有两位女士没有赶上开往德累斯顿的拥挤列车,其中一位是年轻母亲,怀中抱着婴儿,另一位是她的姐姐,手里牵着一个男孩。没办法,他们只好在附近的村庄过夜,他们在一片高地上找到了可以栖身的农场。后来,在男孩能够回想起的童年往事中,这似乎是在德累斯顿燃烧之夜的一次田间漫步。他有时会平静地,但明显带有一丝胜利感地谈起这个夜晚——似乎躲过这场灾难有他个人的什么功劳似的。当难民们回到住处时,大人都久久不能入睡。男孩被放到床上,但是门依然留着条缝,一线亮光从门缝射进屋内。他能看到头顶上有一盏小吊灯,悬绳是一串串玻璃珠。随着灯的轻微摆动,玻璃珠发出清脆的叮当声。因为德国的大炮和高射炮摇撼大地,灯才这样摇晃不停吗?男孩很快进入了梦乡。

这个男孩不知道,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父亲就在两公里之外——确切地说,是在德累斯顿两千米的天空。实际上,他爸爸是德国为数不多的歼击机飞行员之一,为了对抗盟军的轰炸部队而紧急起飞。那一夜,大多数飞机在空中闪电式地飞来飞去,却没有接触到任何敌机,最后只

好着陆。德国的空防部队越来越难以确定英国与美国轰炸部队的行程与目标。战斗机飞行员经常只能利用地面上的一些偶然线索来猜测敌军到底飞向什么地方。

2月13日晚,当男孩的爸爸跟随部队起飞时,他们首先飞往斯特拉斯堡待命,并在斯特拉斯堡上空盘旋,希望能够从地面接收到飞往准确目的地的命令。然而,命令却始终没来。机务人员包括一个飞行员、一个观察员、一个机枪手,还有一个无线电发报员。当地面侦察站突然转播了电台的一个节目,即理查德·施特劳斯《玫瑰骑士》中的一段华尔兹舞曲时,飞机上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战士——两名成员有博士学位——便认为他们明白了目的地所在:维也纳。于是他们调头飞往这座为《玫瑰骑士》提供背景的城市。然而,他们飞行得越远,他们就越发怀疑,维也纳是否真的是盟军攻击的目标。之后,机枪手想起来,德累斯顿才是真正的目的地,1911年1月26日,《玫瑰骑士》在这里进行了首次公演。于是他们飞回德累斯顿,去阻止他们不再可能阻止的事情。

这一切都令人难以置信,然而这却是我父亲在很久之后才告诉我的真事——那时我父亲觉得他已经可以谈论在战争期间他曾经做过和曾经经历过的事情了。非常奇怪的是,施特劳斯的音乐令人想起对德国城市进行轰炸时的隆隆炮声,恰如邱吉尔对比弗布鲁克勋爵所描述的:“由超重型轰炸机执行的一场彻底的毁灭性的绝杀行为。”在作家泽巴尔德所能回忆起的关于空袭的事情中,有一个听到空袭过程的人所作的描述。他说:“恰恰在达姆施塔特毁灭性的空袭开始之前,收音机中播放了施特劳斯的《魔幻音乐》中的一些歌曲,这些歌曲优雅动听,好像来自精美的洛可可世界。”^①一战后不久,瓦尔特·哈森克勒弗尔写了一首诗,诗的主题是对好战的德国军队的控诉。诗的结尾重复

① 泽巴尔德,《毁灭的博物学》,第43页。

着这样一句话：“凶手就在玫瑰骑士中间。”

德累斯顿上空的炸弹和空中的《玫瑰骑士》打造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形象,在我看来,这种形象似乎表明,战争与文化、教育与毁灭、政治与诗歌、精神与暴力的紧密结合已经成为构建德国精神的一部分^①。当德累斯顿被毁灭的消息传到纳粹的领导阶层时,“德国劳工阵线”最高领导人罗伯特·莱伊的第一反应是,肩头的沉重负担终于没有了。“我们终于能够松口气了。总算结束了。现在我们不会再为保护德国文化的遗址而牵扯精力了!”^②三年前,当罗斯托克城遭到英军轰炸时,戈培尔做出的反应与此相似。他对人员的伤亡情况只字未提,却只谈到了以暴制暴的必要性,在德国的“文化中心”被英国皇家空军摧毁之后,德国应该铲平英国的文化中心^③。在纳粹德国,人人都知道,伟大艺术作品的损毁对希特勒的打击要比大型住宅区所遭受的毁灭性攻击严重得多^④。德国的宣传家们有意让这个消息传播开来,因为他们坚

① 当然,这种结合不仅限于德国。例如,早在1944年6月,法国抵抗组织从收音机中听到电台在播放保罗·魏尔兰《秋之歌》中的句子“长长的呜咽/来自小提琴/来自秋天”时,他们就知道盟军即将开始进攻。当后面的两句诗行——“感动着我的心/一片凄清沉闷的单调”——随着电波传来时,就意味着进攻会在48小时内发动。这两句诗行于1944年6月5日晚9:15分从空中传来。第二天盟军便开始大举进攻。德国的反间谍组织得知了这场“阴谋”,但是德国的军事指挥部却拒绝相信盟军的领导人会用诗歌作为军事行动的号令。这一切都归结为保罗·富塞尔所称的“现实生活令人惊奇的文学化”的语境。富塞尔又格外强调了“所有参加了伟大战争的人士的无可比拟的文学性”,这里的伟大战争指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见富塞尔,《伟大战争与现代记忆》,第156页。

② 见费斯特,《在希特勒的地堡中》,第viii页。德国劳工阵线是纳粹在废除了传统的组织机构后,于1933年建立的新组织。

③ 约瑟夫·戈培尔,《戈培尔日记,1942—1943》,第189页,1942年4月27日的日记。

④ 见巴克斯,《希特勒与视觉艺术》,第116—117页。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是可怕的。然而,这些观念并不局限于独裁主义的政权中。美国军方将第二颗原子弹称为“大男孩”。这个“大男孩”最初计划于1945年8月投落在日本京都。然而,J.罗伯特·奥本海默却指出了京都的建筑宝藏及其精神内涵,由此中断了最初的计划。之后,长崎替代京都成为轰炸的目标。

信,这样希特勒的反应便不会被视为对人类苦难的野蛮漠视,人们会认为他具有战争也无法摧毁的强烈的艺术感受。

不仅希特勒与他的幕僚把盟军的轰炸视为对德国文化的毁灭之举,1942年5月,在美国的德国犹太移民策划了一个大型募捐活动,他们用所得的钱款向美国空军捐赠了一架轰炸机,并将该轰炸机命名为“忠诚”。他们希望托马斯·曼能够担任该活动的西海岸委员会主席,托马斯·曼得知后怒火中烧。他愿意为红十字会或者为购买战争债券募集钱款,但绝不可能支持正在摧毁德国城市的空袭部队,尽管这是必要之举。“我不希望在我死后,阅读我的作品的德国人——亦或他们根本不会读——认为我是一个应该对德国文化遗址的毁坏负有责任的委员会的主席。”^①托马斯·曼对德国人的思想形成机制的预见也许是正确的:人们知道对德累斯顿的空袭导致三万人丧生,但是这座城市也因此成为一个文化宝藏遭到严重摧毁的象征——也许这个象征会更为人所铭记——其中最重要的是现在已经重建的圣母教堂。

历史学家约尔格·弗里德里希曾撰写过一部关于德国在轰炸中遭受的苦难的著作,书名为《火焰》。伊恩·布鲁玛在为该书写评论时指出,《火焰》的结尾写道:“人们对德国图书馆和档案馆被焚毁的藏书感到悲伤,这种情绪长久以来挥之不去。这种悲伤之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把它放在一部长达592页的著作的最后却令人感觉颇为奇怪。似乎失去书籍最终要比失去生命更糟糕——特别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也许是正确的;但是这却并不产生什么道德魅力……正如弗里德里希的书中所呈现的,真正的灾难是美丽的古城、古老的教堂、洛可可式的宫殿、巴洛克的城墙和中世纪的街道全部成为废墟。”^②布鲁玛认为《火

① 托马斯·曼于1945年5月5日从位于加州帕西菲克·帕利塞德斯的家中给阿格尼丝·迈尔写的一封信。见托马斯·曼和迈尔,《书信集,1937—1955》,第394页。

② 布鲁玛,《德国的毁灭》,第12页。

焰》的目的是试图纠正“集体背离德国历史和文化的行为”，这一阐释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我不敢肯定弗里德里希的诊断也是正确的。也许作家和历史学家们对文化的损失关注的力度不够。然而，在德国人的集体记忆中，像德累斯顿这样的名字是一种提醒，它让人们更多地想到有多少文化遗产遭受灭顶之灾，而不是丧失了多少生命。我父亲一提到德累斯顿的焚毁，总会提及《玫瑰骑士》。我父亲的这种观点在他那一代人里，应该算不得是例外，而应该是一种常态。

诺贝特·埃利亚斯在他的著作《德国人》中写道：“镶嵌在德国词汇‘文化’中的含义也许是非政治的，甚至有可能是反政治的偏见，这是反复出现在德国中产阶级精英中的征候，即政治与国家事物代表他们引为羞耻、缺乏自由的领域，而文化则代表了他们的自由之邦，而且代表了他们的尊严与骄傲。在18世纪与19世纪的一些时期中，中产阶级‘文化’概念中的反政治偏见将矛头指向了王公贵族的独裁政治……在之后的时期中，这种反政治偏见的矛头则转而指向民主国家的议会政治。”^①这里，埃利亚斯描绘了文化在德国“民主政策”中的角色；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则认为，文化在“对外政策”中的角色是以德国人不由自主地要将文明与文化区分开来的意向为特点的。“在德语用法中，‘文明’指的是有真正用途的事物，但无论如何，这种用途的价值只能屈居第二，它只是由人类的外部表现和人类生存状态的表象组成的。最令德国人引以为豪的、用以阐释他们自身成就与自身存在状态的词汇则是‘文化’。”法语和英语中的文化概念也能指涉政治和经济、技术和运动、道德与社会现实，“德国的‘文化’概念则在本质上指向思想、艺术和宗教，而且有一种倾向，就是在这类事物和另

① 埃利亚斯，《德国人》，第126—127页。

一类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之间,划出明确的分界线”^①。

从根本上说,不仅德国的中产阶级,而且整个德国都因其文化成就及文化渴望而引以为豪、沾沾自喜。德国人对文化的兴趣与热爱,加上对日常政治打着官腔的嘲讽,形成了“德国精神”中不容置疑的、深刻的反政治本质。这种状态最终滋养了德国作为“文化之邦”的自豪感,德国因此断言自己要优越于仅仅拥有“文明”的西方国家。文化在德国国内政策以及国外政策中的独特地位是本书的主题。我谈及了“德国诱惑”,指出这是一种认为文化是政治的高贵代替物的思想,尽管这也许并不见得是更好的政治形态。

埃利亚斯在描述德国“文化”概念中的反政治倾向时,非常惊讶地发现,“特定的思维、行为和感觉方式以一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在同一个社会中,经过许多世代更迭后再次出现,它表现出适应新发展的特点。几乎可以肯定,某些关键词的含义,尤其是某种情感基调已经深入这些方式的骨髓,并且一代一代地传下来,没有人去核查其正确性,经常也未发生任何改变,它们在人们所定义的‘民族性格’的灵活而有韧性的连续发展中占据一定的地位”^②。然而,对“文化”在德语用法中作为反政治关键词进行分析时,我宁愿说这是一种民族姿态,而非民族性格。民族性格有些像人体的皮肤,它或许可以被拉伸——“灵活而有韧性地

① 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第4页。非德意志人谈起“文化”这个被过分虚夸的德国词汇时,很难不带有强烈的反讽色彩。辛克莱·刘易斯在其小说《大街》的开篇介绍女主人公卡尔·肯尼科特时所用的语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打网球,发起暖锅晚会,在戏剧中扮演毕业生讨论会主持人的角色,参加‘双人歌唱’比赛,并且加入了好几个社团,旨在提高艺术品位,接近云遮雾罩的被称作文化的东西。”见刘易斯,《大街和巴比特》,第6页。刘易斯用大写字母来表达其讥讽之意,而门肯却更喜欢用斜体。在他对“国家信件”的批评文章中,他谈到了“所剩无几的新英格兰文化”,在《阿波马托克斯镇的灾难》(1930)中,他将3K党称作“政治上的教会主义,残害黑人,或者说是将残杀他人视为最高宗旨”,并把其称作联邦对“美国文化”做出的重要贡献。见门肯,《国家信件》(1920),载于《成熟醇厚的门肯》,第92、199页。

② 埃利亚斯,《德国人》,第127页。

连续发展”——但是身体却无法摆脱它。而姿态却不同,它的特点是松散;它就像一件令人喜爱的衣服,人们可以随意穿上或脱掉,也可以根据情绪的变化、流行时尚的改变而进行更换。“民族性格”是一个严肃的术语,而“姿态”则包含一丝反讽色彩——正如“盎格鲁—撒克逊姿态”一词,当刘易斯·卡罗尔在1871年的《镜子国中的爱丽丝》中首创该词时,其讽刺意味就非常明显,当安格斯·威尔逊在1956年将它用作其小说的书名时,它的讽刺意味就更加显而易见了^①。反讽对于英国人不同凡响的自信而言是一种平衡力量——英国人坚信他们自己的文明程度,并希望全世界都能承认其优越性。德国人谈到“文化”时的洋洋得意之感,也需要同样的反讽力量——如果不是更加强烈的话——进行调整,因为德国人也自负地认为只有他们拥有“文化”,而其他人只是穷于应付“文明”而已。

本书考察了德国人对待文化的态度,他们将文化视为政治的替代物,同时对政治嗤之以鼻——这里首先把政治理解为议会政治,他们认为政治就是思想狭隘的利益集团进行讨价还价、相互妥协的竞技场。不过这种考察并不是寻找托辞来探讨“特殊道路”的问题,即坚称对政治的反感和对文化的理想主义态度及浪漫的推崇,成为德国为什么偏离了“正常”的西方发展道路,却驶入纳粹灾难的怪圈的主要原因。我

^① 然而,我应该例举出另外的例子,即当这个术语在使用时未带反讽色彩的情形,使用者是一位难以称其为作家的人。1961年,约翰·F.肯尼迪在海恩尼斯问戈尔·维达尔:“你如何解释,像这样一个森林茂密、人烟稀少、仅仅拥有三百万人口的国家,却诞生了18世纪三位伟大的天才——富兰克林、杰斐逊和汉密尔顿?”维达尔指出,美国的宪法和法律的根基在英国,生发于“盎格鲁—撒克逊姿态”——对这个回答,肯尼迪这位爱尔兰天主教徒出身的总统勉强表示同意。在这里我提及这件事情,也是因为“盎格鲁—撒克逊姿态”在本质上与“文化”相通,维达尔在解释富兰克林、杰斐逊和汉密尔顿的伟大之处时说得很清楚:“时间。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在冬天,他们待在农场的家中。他们广泛阅读,写信寄情。很明显,他们拥有充满思考的生活——而这一点现在却无法做到。”见维达尔,《发明民族》,第187—188页。

并不把这种态度看做独一无二的德国现象。然而,我却坚持认为,对文化成就的过高评价,以及“对政治表现出的奇怪的冷漠态度”(古奇语),在德国所起的作用比在其他国家要大得多,其表现程度也比在其他国家要强得多。文化是政治的替代物,这是贯穿在德国历史中的普遍思想——从18、19世纪魏玛的辉煌岁月,到20世纪末两个德国的统一——尽管现在其普遍程度已经大大减弱。彼得·盖伊、乔治·莫斯、弗里茨·林格、弗里茨·施特恩和彼得·菲尔埃克以及其他学者,都曾探讨过德国人对待文化与政治的特殊态度。我重新梳理了他们的论证,试图就这个久已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新见解。

在“国内政策”领域,我大致按照时间顺序论述。文化作为政治的“高贵”替代物的观点是首先在魏玛古典主义的全盛时期提出的。这种以文化的名义远离议会政治的态度,是魏玛共和国为什么没能保持住其民众对它的广泛接纳与情感支援的根源。如果当时能够保持住民众的支持态度的话,那么魏玛共和国便不会沦为纳粹的猎物。首先是法西斯主义,继而是国家社会主义,都展现出强烈的美学魅力。我不认为这种美学魅力是德国历史上最为邪恶的时期的一种表面现象,而是将其视为大部分德国资产阶级和许多德国作家、艺术家试图阐释纳粹思想意识的魅力根源的重要因素。甚至那些流亡的知识分子,也依然将文化与政治对立起来。二战后,以文化为阵地对议会政治保持冷漠与距离的姿态显得越来越不明智,既不利于联邦德国,也不利于统一的德国融入西方民主国家的主流形态。然而,古老的文化渴盼与崭新的政治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却可以首先用来阐释两个德国的发展,之后可以阐释一个不再自鸣得意地将自己称为唯一的文化之邦——这是承受了自我造成的政治灾难的结果——的国家的发展,因为这个国家从政治再统一中受益良多。

在“对外政策”领域,我集中研究两个问题——同时提及中欧的情

况,因为发生在20世纪后期的中欧的剧变,被视为文化对于政治的胜利而受到称赞,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是如此。我研究的第一个问题是“文化战争”——据我所知,这个术语在法国首创——它曾经在塑造法德关系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研究的第二个问题是德国文化遗产与美国政治传统之间的相互影响。关于欧洲与美国的文化爱国主义的那一章,是德美关系研究的尾声,展示出针对文化与政治关系的辩论是多么激烈,这种辩论在近年来出现的欧美摩擦中仍然存在。

我的阐述并不是要与早已确立的政治与社会历史的研究方法相抗衡,我也不是要连续讲述德国不同的历史时期之间相得益彰、彼此交融的故事。我非常清楚这种“观念史”的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正是为了保持德国在欧洲大陆的支配地位,俾斯麦在1871年普鲁士战胜法国后建立了德意志帝国。文化民族转型为文化国家,这自然是个令人欣慰的结局,但却不是俾斯麦战略的初衷。德国诗人兼先知们对议会政治所持的怀疑态度,是导致魏玛共和国走向末路的一个因素,但是,与凡尔赛的幽灵、通货膨胀的冲击、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以及国家主义与种族主义思想的复辟相比,这绝对算不上是决定性的因素。与其说纳粹掌握政权是因为其仪式程序的美学魅力,不如说是因为他们重拾德意志自豪感的誓言,他们要限制大型公司集团发展、创造就业机会的承诺,以及他们所撒播开来的反犹太人的情感吸引,还有一些其他因素。战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内部发展同样以其精英阶层的文化政策为特点,不过这种政策依据的却是苏联持续不断的战略利益——苏联把东德作为其与资本主义西方的政治上与军事上的缓冲地。政治冷漠与文化激情在战后的西德蔓延开来,至少这是许多知识分子观察者眼中的事实。然而以实用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政治领导人,却使国家在政治与经济方面迅速得以复苏,这些领导人知道如何管理工会、组织政党、发放养老金。

简言之,思想的历史只是社会历史与政治历史的附属物,而非替代

物。在很大程度上说,思想的历史只是一小部分人的历史,即知识分子的历史。只有知识分子自己才把知识分子对历史发展过程的影响视为理所当然;而他们的思想如何传播给更多的公众,以及他们最终会对历史施加何种影响等问题,则一直悬而未决。人们也许把思想史或观念史视为社会历史和政治历史这座壮观建筑上的一件装饰,可以轻易地被清除干净。不过,在清除之后,这座建筑虽然不会坍塌,但却不再是从前那座建筑了。可见,思想史并非华而不实、可有可无,而是政治与社会历史的有益装饰。它提醒我们,人类历史不仅仅是由人们的所作所为构成的,还包括人们的所言所说、所思所想。历史关心的不仅是发生了什么,历史还包含着意义与道理。

一种态度就是一个阐释行为:这是对社会中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或者应该发生什么事情进行的评判。本书描述了贯穿整个德国历史的知识分子的态度:以政治,尤其是议会政治为代价来过度抬高文化的价值。我没有进行宏大的记述,我是想引领读者踏上这样一个旅程:为读者展示一个个历史片断或“星座”,让读者看到,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这种态度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通过研究一些在历史的“星座”中反复出现并起到了一定作用的问题与思想、主题与作者,我希望能够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中,梳理出一条环环相扣、连贯发展的旅途。在这个旅途的某些地方,我将跟随一位向导的引领,从他的一生中,从他遗留下来的书信中,可以看到,对待政治和文化的“德国姿态”,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以不太适当或自相矛盾的方式,得到了最撼动人心的表达,其诚实程度经常令人痛苦不安,并且总是带着反讽的态度。这个人就是托马斯·曼。

本书展示的是思想的历史。仅仅通过探讨德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生活,人们当然不能了解德国历史,然而,通过考察知识分子的思想生活,人们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德国历史。

目 录

CONTENTS

导言 德累斯顿上空的炸弹与《玫瑰骑士》	1
一 文化：崇高的选择	1
衰减的特性	1
冷漠的政治观	4
德意志精神与德意志帝国	11
二 从共和到流亡	24
托马斯·曼的政治观念	24
法西斯主义的美学魅力	34
艺术与道德	46
流亡与移民	50
三 诺瓦利斯与惠特曼：德国浪漫主义与美国民主	61
没有歌剧的国家	61
约瑟在美国	67
德国的民主	71
爱默生的舵手：贝多芬与贝蒂娜	80
四 德国文化在国外：失败中的胜利	87
美国精神的封闭	87
面临危机的德国精神	97
平静地告别欧洲	101

五 法德文化之战	107
两次革命	107
“流亡”的歌德	113
“文化战争”的根源	117
社会学史上的谜团	122
文化使者：哈布瓦赫	125
逐出柏林	129
哈布瓦赫之死	131
奇怪的失败	134
知识分子的抵抗	137
德国革命的局限性	144
 六 德国本土文化：道德的崩溃与智性的崛起	151
德国的浩劫	151
文化的复苏	159
内心的流亡	164
德国人与犹太人的流散	173
 七 典型的德国人：浮士德与墨菲斯托	185
民意调查中的歌德	185
1945 年之后的歌德	192
 八 德国的再统一：知识阶层的失败	199
文化的卫士	199
东德知识分子的灾难	201
知识分子的悲喜剧	205
 九 伪文化：中欧的终结	212
欧洲：梦想与官僚	212

文化胜过权力	215
十 反讽与政治：欧洲与美国的文化爱国主义	224
热爱美国的欧洲人	224
哈姆雷特与福丁布拉斯	229
欧洲侏儒与美国巨人	235
美国历史的反讽	237
十一 统一后的德国：寻求道德典范	242
文化与现实政治	242
政治问题的文化出路	245
参考文献	253
译名对照表	266

文化：崇高的选择

衰减的特性

如果能给独特的德国意识形态下定义的话,可以说它包括了浪漫主义与启蒙运动的对立、中世纪与现代世界的对立、文化与文明的对立以及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的对立。基于文化期待与文化成就,人们一直坚信德国走的是一条特色之路,一条“特殊的道路”,这种信仰在这个诗人与思想家的国度里始终是一种骄傲。在政治性国家建立的一百多年前,德国唯心主义哲学、魏玛的古典主义文学以及古典与浪漫的音乐风格早已联手建立了一个内在的精神王国。自此之后,个人从政治领域退身至文化领域和私人世界的行为都被赋予了特殊的高贵色彩。文化被看成了政治的高贵的替代物。

这是我曾在第一本书《忧郁与社会》(1969)中描述的德国意识形态。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曾在他的文章中引用了我的观点,我一度因此非常开心。后来意识到他引用我的原话是为了阐释西班牙的现代历史特点,我的开心变成了深深的迷惑。这段经历使我得到了一个讽刺性的教训:德国历史并不像德国人普遍认为的那样与众不同。在很多时候、很多地方,文化都被看做政治的替代物。在西班牙,“九八